

共同威胁、感知错位 与中东地区安全合作困境^{*}

张楚楚

【内容提要】 中东地区的安全合作经验表明,在面对共同威胁时,该地区的相关国家很难形成制度化程度较高的安全合作机制并保持高效合作。传统的威胁平衡模型难以解释中东地区的安全合作困境,也未能结合地区安全情境来甄别多元决策主体在感知多重威胁来源时的差异化反应。作者在对威胁平衡理论进行修正以及对共同威胁与威胁感知进行情境化拓展的基础上,引入威胁反应、威胁衍生和威胁排序三个中介变量,揭示了威胁感知的复杂动态以及主体间的认知差异。实证研究发现,自2011年西亚北非动荡以来,共同威胁不但没有刺激中东地区各决策主体产生相似的威胁感知,反而加剧了相互间的防范。由于威胁感知的多样化错位,中东地区的集体威胁平衡遭到干扰甚至破坏,致使中东地区的合作组织、次区域合作机制及非正式安全倡议等实践反复受挫。

【关键词】 中东地区;感知错位;威胁平衡;地区安全合作;西亚北非动荡

【作者简介】 张楚楚,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上海 邮编:200433)。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 (2026) 05-0062-26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22VMG029)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一、问题的提出

地区安全合作是指特定地理区域内的国家通过相关机制共同应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以促进区域稳定与和平发展的协作模式。在众多地区安全合作的实践中,中东地区经常被视为“例外”。中东地区安全合作的实践表现与合作绩效并不理想,主要表现在三方面:首先,中东社会不仅具有天然的文化亲近感和地理联系,而且经历过“泛阿拉伯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跨国意识形态运动,但地区的同质性并未转化为区域性安全合作的优势。2002年《阿拉伯地区人类发展报告》指出,阿拉伯国家集团可能是世界上最具地区合作潜力之所。^①相较于欧洲、东南亚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区,中东各国有着共同的历史经历,社会、文化和宗教同质化程度更高,阿拉伯世界更是如此。然而,中东仍是地区安全合作的“缺失地带”,^②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此种失败经验印证了“阿拉伯人的最大公约数就是他们无法达成一致”的论断。^③

其次,从地区安全比较的视角来看,中东不仅不属于安全形势总体较为稳定的区域,反而是全球安全挑战最突出的地区之一。从冷战期间的多场地区战争到“9·11”事件后中东恐怖主义的持续蔓延,再到21世纪初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加剧中东安全困境,该地区安全问题不断积累,长期面临复合型安全赤字。其中既包括以武装冲突为主要形式的传统安全风险,也包括恐怖组织坐大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同时还涉及以政权更迭为代表的政治安全风险。^④近年来,安全威胁格局进一步演变,从2011年西亚北非动荡引发整个地区的反政府浪潮到此后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恐怖主义的蔓延,各类共同安全挑战不断浮现。

最后,中东地区不乏旨在加强地区团结与国家间合作的尝试,但层出不穷的地区一体化倡议和区域合作平台与失灵的地区安全合作成效形成鲜明对比。^⑤成立于

① UNDP, “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2: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Regional Bureau for Arab States, 2002, p. 121.

② Ali Carkoğlu, *Mine Eder and Kemal Kirişc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Routledge, 1998, p. 30.

③ Dahlia Kholaf, “Arab League Leaders Agree Not to Agree,” <https://www.aljazeera.com/features/2014/5/19/arab-league-leaders-agree-not-to-agree>.

④ 王林聪:《中东安全问题及其治理》,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2期,第12—17页。

⑤ Louise Fawcett, “Regionalism and Alliances in the Middle East,” in Louise Fawcett,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Middle Ea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2021–2226.

1945年的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堪称世界上较早成立的地区组织之一，却以效率低下和名不符实著称。除1961—1963年斡旋科威特与伊拉克冲突等少数案例外，^①阿盟在多数情形下既未能有效调解或制止战争，也无法化解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分歧。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盟尚且充当了阻止阿拉伯国家间兵戎相见规范的宣传阵地与社会化场域，20世纪90年代初海湾战争的爆发则彻底暴露了阿拉伯国家表面团结下的深刻裂痕。随着阿盟作用的日益衰弱，中东国家将区域合作重心由全区域转向次区域层面。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成立的阿拉伯合作委员会与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经历短暂运转后即陷入机制停摆，前者建立一年后即宣告解散，后者自2008年以来未曾举办过高级别会议。即便是所谓中东次区域合作典范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在2011年协同应对巴林民众抗议后，不仅在多数领域的合作浮于表面，^②而且由于2017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同卡塔尔断交而一度陷入瘫痪。

西亚北非动荡以来，在地区安全形势渐趋复杂化且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组织普遍失灵的背景下，中东国家一方面积极签署地区国家间的双边合作协议，另一方面偏好灵活的单一功能性联盟策略，在应对“伊斯兰国”极端主义威胁等具体事务上开展了周期短暂且流动性较高的松散联盟行动。它们的策略性合作不仅缺乏高效协同，更常常出现在某些议题上联合却在另一些问题上对立的现象，这似乎再次印证了该地区难以摆脱“地区团结宏愿长存却冲突不断”的宿命。^③

基于上述现象，本文试图系统性地探究如下核心问题：西亚北非动荡以来，为什么处于共同威胁下的中东国家未能形成高制度化的安全合作机制并提高合作效率？为什么中东地区频繁发起安全合作倡议，却又无法依赖它们来维护地区稳定？本文突破了传统威胁平衡理论的线性假定，通过引入“威胁反应—威胁衍生—威胁排序”的三重中介变量体系，构建了更具解释力的威胁平衡动态分析模型。该模型尤其关注地区国家权力边界模糊与利益范围错位的现实特征，解释了威胁认知分化的内在机理，为理解地区安全合作动力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① 陈丽蓉：《阿拉伯国家联盟及其安全治理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137—151页。

② Turki Al-Hamad, “Imperfect Alliances: Will the Gulf Monarchies Work Together?” in Barry Rubin, ed., *Crises in the Contemporary Persian Gulf*, Frank Cass, 2002, pp. 21–32.

③ Martin Beck, “The End of Regional Middle Eastern Exceptionalism? The Arab League and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After the Arab Uprisings,” *Democracy and Security*, Vol. 11, No. 2, 2015, p. 191.

二、对于中东安全合作既有解释的局限

地区安全合作已成为中外社会科学界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但学界往往倾向于关注某些地区的特定安全议题，相对忽视了另一些地区的其他重要问题，致使既有研究虽能窥其一斑却难见其全貌。国际关系学者遵循议题导向范式，侧重于欧洲和亚洲的经验归纳，^① 尤其聚焦欧盟防务一体化的制度设计与组织实施、东盟的地区安全机制演进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等议题，^② 而较少关注中东等地区的负面案例。区域研究学者秉承区域导向传统，通常将中东的地区安全合作实践置于“中东例外论”的框架下加以审视。既有文献中不乏对该地区特殊合作路径与联盟形态的描述，^③ 却较少深入讨论造成此类“异常”合作形态的成因。两种研究范式均为丰富全球知识体系的重要手段，但随着精细化学科分工的不断推进，当前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学者日益倾向于在各自的领域独立开展实证研究和知识生产，造成了“一般论”与“特殊论”的二元叙事边界。^④ 本文旨在打破两种研究范式的藩篱，聚焦中东地区安全合作实践的负面案例，尝试对该地区安全合作实践失灵的影响因素和因果机制进行理论解释，希冀能促进地区合作理论的发展。

目前关于中东地区安全合作的研究主要遵循五种理论路径：一是新功能主义视角。该视角指出，地区合作通常始于通信、交通和卫生等低政治领域，随后向其他功能性领域及高政治领域“外溢”。^⑤ 西方学者常以欧洲为参照，^⑥ 认为中东国家缺乏地区内合作的意愿与基础。例如，保罗·阿兹（Paul Aarts）认为，中东经济合作很难超越现有的自由化边界，低政治领域合作尚且进展缓慢，遑论更高层次的政治

① Helga Haftendorn, Robert O. Keohane and Celeste A. Wallander, eds., *Imperfect Unions: Security Institutions over Time and Spa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② 赵怀普：《欧盟共同防务视阈下的“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探究》，载《欧洲研究》，2020年第4期，第31—49页；刘若楠：《权力管控与制度供给——东盟主导地区安全制度的演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3期，第79—107页。

③ 孙德刚、凌胜利：《多元一体：中东地区的弱链式联盟探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1期，第46—75页；赵跃晨：《沙特阿拉伯的特殊联盟政策：实践、动因和限度》，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3年第2期，第47—70页。

④ 刘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困境、进展与前景》，载《外交评论》，2017年第1期，第38页。

⑤ Ernst B. Haas,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The European and the Universal Proces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15, No. 3, 1961, p. 372.

⑥ Richard Higgott,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gion: The Changing Global Context,” in Bertrand Fort and Douglas Webber, eds.,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and Europe: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Routledge, 2006, p. 23.

与安全合作。^①阿拉·丁·阿拉法特 (Alaa Al-Din Arafat) 指出,海合会应对安全威胁失利的重要原因在于成员国经济改革缺失与国家间经贸联系薄弱。^②也有学者认为,基础设施联通不足、经济结构单一、对外依赖度高以及国际经济相互依存度低等因素制约了中东功能性合作。^③然而,新功能主义视角的解释力存在不足。功能性合作条件缺失并非中东地区的独有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拉美与非洲国家推动地区一体化时,同样面临经济结构同质化、国家间合作意愿薄弱以及高度依赖西方发达国家等问题。^④但在功能性合作基础同样薄弱的情形下,东盟多次遏制成员国间大规模冲突,^⑤南美洲国家联盟曾促成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争端的和解,^⑥非盟也在索马里和苏丹等国开展一系列调解与维和行动。^⑦相比之下,阿盟等中东区域机制则表现不佳。这表明,功能性合作虽然可能助推地区安全合作,但并非不可或缺的前提。

二是自由制度主义视角。该理论同样源于欧洲经验,强调区域制度对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作用。^⑧部分文献基于这一思路分析了阿盟等机制存在决策制度安排缺陷。^⑨穆吉塔巴·阿里·伊斯ანი (Mujtaba Ali Isani) 指出,阿盟疏于履行规范性承诺,并因此丧失了社会合法性,这是其绩效失能的根源。^⑩玛丽亚·德布雷 (Maria Debre) 也分析了阿盟选择性运用地区制裁影响成员国内政事务的

① Paul Aarts, "The Middle East: A Region Without Regionalism or the End of Exceptionalism?"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0, No. 5, 1999, p. 912.

② Alaa Al-Din Arafat,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owers in the Gulf Security*,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pp. 199-238.

③ 金良祥:《试析中东地区主义的困境与前景》,载《西亚非洲》,2017年第4期,第95页;张锐、岳锋利:《能源转型背景下阿拉伯电力一体化的进展与阻碍》,载《西亚非洲》,2022年第2期,第108—115页。

④ Shaun Narine, *Explaining ASEAN: Reg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 Lynne Rienner, 2002, pp. 24-27.

⑤ 马银福:《东盟安全观的演变、特点及成效》,载《国际安全研究》,2024年第2期,第101页。

⑥ 李德鹏、思特格奇:《国际政治中的经验理性:本土实践与互动经验》,载《拉丁美洲研究》,2022年第4期,第69页。

⑦ 贺杨、袁正清:《非盟维和行动的类型学论析——以苏丹、索马里和中非共和国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3期,第31—52页。

⑧ Robert O. Keohane and Lisa L. Martin, "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1995, pp. 39-51; Yoram Z. Hafetel, *Region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Conflict Mitigation: Design, Implementation and the Promise of Peace*,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2, pp. 30-50.

⑨ 陈万里、赵军:《试论阿盟决策制度与阿拉伯一体化的发展》,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年第2期,第34—39页。

⑩ Mujtaba Ali Isani, "Securitization, Legitimization, Rhetoric, and Reg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MENA Region: Learning from the League of Arab States," *Contemporary Review of the Middle East*, Vol. 12, No. 3, 2025, p. 249.

弊端。^① 自由制度主义对中东地区安全合作困境的解释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方面，该理论虽然指出地区安全组织的制度缺陷，但没有阐明为何中东地区先后出现的各类地区安全组织都存在类似的制度问题，也未能揭示该地区缺乏超国家管控机制的根源；另一方面，自由制度主义的一个基本假定是，政府政策协调需求与民众反对主权让渡之间的悖论是造成地区安全合作困境的主因。^② 然而这一解释与中东地区的政治现实不符。刘中民等指出，尽管共同的信仰会促使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形成，“但未能有效地将幅员辽阔、人口稠密的伊斯兰世界团结成一个强大的政治经济实体”。^③ 事实上，中东地区阿拉伯世界共同的历史记忆、宗教信仰与语言体系不仅没有形成“民意约束”，反而致使社会层面的超国家认同有时可能超越国家认同。如在2017年卡塔尔断交危机期间，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国民众因部落归属与文化共情，对本国实施的封锁政策表现出强烈不满。^④ 相较于欧洲，中东地区自下而上的民众诉求与自上而下的跨国议程存在较强的兼容性，民意往往并不反对实现跨国合作，因此该地区政府间脆弱的安全合作机制可能源于某些被自由制度主义视角所忽视的原因。

三是国家同质性视角。这一理论路径认为，国家间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相似度越高，彼此间的缔约成本就越低，合作越易于达成。^⑤ 有学者指出，中东国家间异质性显著，如以色列犹太文化与中东伊斯兰文化之间存在鸿沟，阿拉伯文化与土耳其、波斯文化之间也差异显著，导致不同民族和宗教主导的国家难以形成共同规范。^⑥ 也有研究发现，周期性宗派对抗浪潮的出现构成了中东地区安全合作的重要阻力。^⑦ 但该视角难以解释为何同样属于阿拉伯民族、使用阿拉伯语、主要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且政治制度高度相似的阿拉

① Maria Debre, "Legitimation, Regime Survival, and Shifting Alliances in the Arab League: Explaining Sanction Politics During the Arab Spr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2, No. 4, 2021, p. 516.

② Yannis Papadopoulos, *Democracy in Crisis? Politics, Governance and Policy*,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③ Zhongmin Liu and Peng Fan, "Islamic Factors in Inter-State Cooperation of the OIC Members," *Asian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Vol. 12, No. 1, 2018, p. 1.

④ Larbi Sadiki, "Regionalism in Crisis: GCC Integration Without Democracy,"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It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5, No. 2, 2020, p. 24.

⑤ 田野：《国际制度的形式选择——一个基于国家间交易成本的模型》，载《经济研究》，2005年第7期，第100页。

⑥ Ali Bakir, "Turkey's Security Role in the Gulf Region: Exploring the Case of a Newcomer," *Turkish Studies*, Vol. 24, No. 5, 2023, p. 821.

⑦ Raffaella A. Del Sarto, "Sectarian Securit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Case of Israel,"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7, No. 3, 2021, pp. 759-778.

伯国家之间仍然未能建立有效的安全合作机制。迈克尔·巴尼特（Michael Barnett）等指出，阿盟成立 50 年间通过了 4000 多项涉及阿拉伯国家整体利益的决议，其中有 80% 未能落实。^① 此外，1963 年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沙尘暴战争”、1990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等事件也表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并不少于其与非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

四是权力结构视角。该视角批判了基于欧洲经验提炼的理论路径，主张从中东自身的地区特征出发，指出国家在面对安全威胁时的策略选择深受国际与地区权力结构的双重影响。在国际权力结构层面，中东各国的安全合作模式显著受制于外部大国的深度干预。冷战期间，美苏通过扶植阿拉伯国家代理人形成地区对抗格局；^② 冷战后，西方国家推行的多重和平计划彼此冲突，不仅削弱了地区国家主导安全事务的能力，还加剧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持续对抗。^③ 在此背景下，中东国家未能发展出有效的“制度制衡”战略以应对体系压力。^④ 在地区权力结构层面，中东地区不存在一个稳定的地区性霸权，更多体现为多极竞争格局，^⑤ 这使得该地区难以形成高度制度化的共同规范来约束各国过度追逐自身利益的行为。^⑥ 权力结构视角的缺陷在于，地区主导大国的存在并非安全合作机制构建的必要条件。相反，有研究指出，在中小国家林立的地区环境中，行为体可能更倾向于通过建立“抱团取暖”式的集体安全合作来共同应对安全风险。^⑦

五是社会建构主义视角。该视角认为，地区安全合作的持久性取决于行为体基于认同取向和情感支持形成的主观相互依存。^⑧ 有研究发现，中东地区流行的规

① Michael Barnett and Etel Solingen, “Designed to Fail or Failure of Design? The Origins and Legacy of the Arab League,” in Amitav Acharya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 eds., *Crafting Cooperation: Regional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80–220.

② Shahram Chubin, “Gains for Soviet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6, No. 4, 1982, pp. 122–152.

③ Marco Pinfari, “Reg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Oxford Handbooks Online*, 2016, DOI: 10.1093/oxfordhb/9780199935307.013.86.

④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Routledge, 2009, p. 9.

⑤ Marco Pinfari, “Reg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Oxford Handbooks Topics in Politics*, 2016, DOI: 10.1093/oxfordhb/9780199935307.013.86.

⑥ Avraham Sela, *The Decline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Middle East Politics and the Quest for Regional Order*,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pp. 31–56.

⑦ 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 Routledge, 2009, pp. 43–58.

⑧ Joachim Schild, “National v. European Identities? French and Germans in the European Multi-Level System,”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39, No. 2, 2001, p. 335.

范与国际体系中的规范存在明显的张力。如巴尼特指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规范框架源于独特的阿拉伯身份认同，而各国对规范解释权的争夺导致阿拉伯国家体系的分裂。^① 哈立德·库莱非（Khalid Abdulaziz Al-Khulaifi）在对海合会的分析中也发现，成员国在历史、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上的认知差异致使该组织的内部矛盾难以调和。^②

尽管建构主义理论被视为连接国际关系与中东区域研究的重要桥梁，^③ 且在分析中东问题时展现出较强的解释力，^④ 但其理论框架仍存在明显缺陷。一方面，该理论将中东阿拉伯世界视为单一的文化与民族体系，采用二分法将阿拉伯民族认同视为该地区内生的前现代因素，^⑤ 国家主权则被归为外部强加的现代规范，二者被预设有一种互斥关系，导致其对中东多种行为体的描述与理解过于简单化，而且难以解释拉美和非洲等同样具有前现代因素却能在区域安全合作中取得进展的情况；另一方面，该视角的逻辑起点与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 Said）所批判的东方主义叙事类似，强调中东的先天劣势是阻碍当代地区发展的主因，并假定只有深谙区域知识的学者方能分析中东问题。^⑥ 此种假定难以脱离地域情境局限，极易强化“中东例外论”的话语陷阱，导致理论模型难以推广。

上述五种理论为理解中东安全合作困境提供了多维分析视角，但仍存在不足之处。一方面，上述视角或机械套用欧洲的经验模式而未能充分考虑中东地区的具体情境，或过度强调地区特殊性而落入“例外论”的窠臼，限制了研究的解释效力与应用价值；另一方面，既有成果大都侧重理论建构，缺乏对中东具体安全合作案例的持续追踪，使理论框架与经验现实之间存在明显断层。鉴于此，下文尝试通过修正威胁平衡模型，并结合中东局势动荡后的地区安全合作实践进行细致分析，探寻兼具中东案例解释能力与普遍适用性的理论洞见。

① Michael Barnett, *Dialogues in Arab Politics: Negotiations in Regional Ord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5.

② Khalid Abdulaziz Al-Khulaifi, "Shifting Sands: Threat Perceptions and Security Among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Member States,"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27, No. 6, 2025, pp. 905-926.

③ Morton Valbjørn, "Review: The Meeting of the Twain: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Middle East Studie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38, No. 2, 2003, pp. 163-173.

④ Raymond Hinnebusch,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Louise Fawcett,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Middle East (2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60.

⑤ Kalevi J. Holsti, *The State, War, and the State of 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18.

⑥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Pantheon Books, 1978, pp. 31-48.

三、威胁平衡模型及其修正

笔者认为，基于新现实主义框架的威胁平衡理论能够有效弥合“欧洲经验论”与“中东例外论”的分歧。对此，本文尝试结合中东地区独特的地缘政治特征，从威胁平衡视角构建一个兼具区域适应性和理论普遍性的综合分析框架，以期更准确地解释中东国家参与地区安全合作的行为逻辑。

（一）威胁平衡模型及其不足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结构现实主义曾一度兴盛，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提出了权力平衡理论，受到安全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华尔兹认为，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每当一国的权力增长可能危及整个体系的权力平衡时，其他国家则倾向于通过联盟制衡该国的霸权企图，致使均势不断出现。^① 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通过对中东国家的考察，发现了权力平衡理论对中小国家行为解释的缺陷并加以调整，为研究中小国家的地区安全合作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他认为，权力并不强大的国家也可能成为多国制衡的目标，因此国家制衡的对象并非权力而是威胁。通过系统性的实证分析，沃尔特发现中小国家选择制衡策略的频率高于追随策略。为深入研究“中小国家为什么选择联盟”这一问题，他聚焦地理邻近性、崛起国的整体实力与进攻实力以及中小国家主观威胁感知等多种因素组合。^② 相较于权力平衡理论，威胁平衡模型看起来更加符合中东地区的实际：一方面，该地区不存在拥有绝对权力优势的霸权国；另一方面，近年来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不少地区强国将伊朗视为主要制衡对象，而非中东地区唯一的拥核国家以色列，进一步表明它们的地区安全优先级是威胁遏制而非权力制衡。

不过，威胁平衡模型在解释中东安全合作时仍存在两点缺陷。第一，尽管学界主流认为中东国家多为现实主义行为体，倾向于选择成本较低与代价较小的行为，^③ 但巴尼特的研究发现如下悖论：“很少有关于阿拉伯政治的论述认为国家利益源于无政府状态。”^④ 换言之，采用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论著在分析中东案例时往往难以完全排除身份、观念和社会关系等非物质权力因素。第二，新现实主义理论基于两

①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 127.

②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2-26.

③ Joseph S. Nye,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Longman, 1997, pp. 163-173.

④ Michael N. Barnett, *Dialogues in Arab Politics: Negotiations in Regional Order*, p. 4.

个基本假定：一是国际体系的特征是国家间的权力分配，因此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是影响国家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二是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的基本单位。从这一视角出发的区域研究学者往往将中东地区视为大国竞争的角斗场，过分强调域外大国对中东地区安全合作的影响。如路易斯·福西特（Louise Fawcett）等认为，外部力量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安全合作的初期发挥促进作用，但随着地区内国家逐渐抵制外部霸权并寻求地区主导权，其负面影响可能会迅速上升。^①莫妮卡·盖利浦（Monica Gariup）指出，冷战期间美苏扶持不同的中东国家，催生了深层次的区域地缘政治对抗；冷战后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推行彼此冲突的和平议程，不但限制了地区国家自主构建区域安全架构的能力，而且引发了各行为体之间的持续性矛盾和冲突。^②这种单一维度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其不仅悬置了单元层次变量的解释效能，更是在系统—单元辩证关系中将非国家行为主体降格为理论建构的“暗物质”。

（二）威胁平衡模型的情境化

基于上述理论探讨，本文旨在对沃尔特的经典威胁平衡模型进行理论修正与情境化拓展，从而构建一个更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来阐释中东地区安全合作的发展轨迹与内在机理。具体而言，本文尝试从三个维度对原理论模型进行深化与调适：一是解构共同威胁在中东地缘环境中的多维作用机制，二是厘清区域行为体在威胁感知过程中的主体差异性，三是揭示威胁感知的动态形成过程。

1. 感知情境

既有文献应用威胁平衡模型解释地区安全合作现象时往往基于以下假定，即当地区共同威胁出现时，其直接威胁对象是周边各国，因而会引起地区各国的安全焦虑与平衡行动。这一假定的局限性在于它仅仅从国家间相互作用的视角关注单一威胁及其结果，忽视了共同威胁可能在中观层面给地区结构带来的多维影响。不同于新现实主义和主流建构主义主要关注体系层次或单元层次的要素，本文关注地区与国家间的互构作用，并指出地区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国家间的行为模式和关系。因此，当在不同的地区情境中出现共同威胁时，可能引发地区国家不同的感知和行为。本文指出，共同威胁的出现实质上挑战了一个地区既有的权力结构，进而对地区各行为体产生多维影响。

^① Louise Fawcett and Helene Gandois, "Regionalism in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Implications for EU Studies,"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20, No. 5, 1999, pp. 617-636.

^② Monica Gariup, "Regionalism and Regionalization: The State of the Art from a Neo-Realist Perspective," in Cilja Harders and Matteo Legrenzi, eds., *Beyond Regionalism? Regional Cooperation, Regionalism and Regional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Routledge, 2008, pp. 69-88.

中东地区结构的一项关键特征是国家间的权力边界不清晰。主流国际关系学者普遍认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主权—领土（边界）—人口（认同）”三位一体的国家概念，强调国家在一定范围内、针对具有相同身份认同的特定人口行使主权。^① 但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等指出，此种阐释侧重国家地位的法律属性，难以反映现实中的经验表现。^② 作为诞生于欧洲的制度框架，“现代国家”在传播至世界各地的过程中，各地区的历史传统与精英的现代化叙事造成了截然不同的国家地位和主权概念内涵。例如，后殖民时代的老挝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依托佛教与曼陀罗理念理解“现代国家”，^③ 拉美各国则在缺乏核心族群的背景下构建兼具脆弱性与包容性的民族国家认同。^④ 在中东地区，目前的国家疆界多为奥斯曼帝国解体后西方殖民者的人为划分，既不符合自然地理条件，也违背了人口自然聚落规律，基于传统血缘关系的部落和基于宗教认同的“乌玛”（Umma）挑战着制度结构薄弱的领土国家。

这种地区结构特征带来了三个结果：一是领土国家的稳定性不足。中东地区人文地理分异与国家疆域版图严重错位，导致民众对现行领土安排缺乏认同，因此国家领土框架并非“稳定、具体和自我封闭”，^⑤ 极易引发版图的重构与地区秩序的变迁。这种领土认同的缺失不仅造成地区秩序的不确定性，也使各国长期深陷安全焦虑。二是国家间相互渗透性强。除国家认同外，中东民众还存在民族、信仰、教派和部落等多重身份认同，各国及非国家行为体可通过激发某些跨境集体记忆干涉他国内政，致使各国政治易受外部渗透，加剧安全困境并削弱国家间的基本互信。三是国家间权力差距较小。国家间彼此干预的方式并不局限于军事进攻，还可以采取操纵非国家认同与集体身份的方式，物质资源有限的小国也可通过软实力战略与物质实力更强的国家竞争。如卡塔尔将支持政治伊斯兰作为杠杆，凭借半岛电视台争取阿拉伯世界话语权，推动“大外交”路线与塑造地区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中东地区长期处于权力弥散状态，其地缘政治格局呈现多极竞合特征，始终未能形成

^① James A. Caporaso, “Changes in the Westphalian Order: Territory, Public Authority, and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 No. 2, 2000, pp. 8-11.

^② Robert H. Jackson and Carl G. Rosberg, “Why Africa’s Weak States Persist: The Empirical and Juridical in Statehood,” *World Politics*, Vol. 35, No. 1, 1982, p. 3.

^③ Alan Chong, “Small State Security in Asia: Political and Temporal Constructions of Vulnerability,” in Clive Archer, Alyson J. K. Bailes and Anders Wivel, eds., *Small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Europe and Beyond*, Routledge, 2014, pp. 202-222.

^④ 思特格奇、王映黎：《民族身份对拉美区域国际政治“非对抗性”的影响》，载《拉丁美洲研究》，2024年第6期，第105—132页。

^⑤ 赵莹：《隔离墙、土地与房屋：地缘政治与生命政治的交互——一项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的民族志研究》，载《开放时代》，2018年第5期，第187页。

具备长期系统性支配能力的地区霸权国,^① 埃及、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等曾经或现在正进行短暂霸权尝试的国家往往无法同时在军事实力、经济力量、自然资源、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方面产生压倒性优势,由此进一步缩小了部分地区大国与小国之间的权力差距。例如,尽管沙特阿拉伯与卡塔尔在物质实力上分别被视为地区大国与小国,但双方的安全博弈并未明显地呈现出单向威胁态势,而是形成了非对称的相互威胁格局。

当某种地区力量对多个行为体构成共同威胁时,意味着原本脆弱的地区权力结构受到冲击,领土国家的不稳定性突显,国家间跨越边界的相互渗透或将加剧。在这种情形下,决策主体在考量是否参与地区安全合作时不仅会着眼于应对共同的地区威胁,也会防范其他行为体在新结构中的扩张野心与行为变化。

2. 感知主体

新现实主义通常将国家视为同质化黑箱,因此传统的威胁平衡模型假定国家是威胁感知的主体。然而,民族国家并非铁板一块,许多后发国家普遍存在国家建构缺陷以及执政精英合法性不足等问题。在此类情境中,执政精英团体才是感知并应对威胁的核心行为体。在安全威胁评估时,他们的首要关切是政权利益而非国家利益。

本文认为,分析中东安全合作模式需要考虑该地区国家和精英团体利益范围不吻合的特征。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将国家的合法性来源分为传统型统治、魅力型统治和法理型统治,其中法理型统治最稳定,因为在此情形下民众服从的是制度而非个体。^② 而中东多数国家属于前两种类型:君主制国家多为传统型统治,共和制国家易出现魅力型统治,两类政体均存在脆弱性与不稳定性。

除少数国家特定时段外,中东多数共和制国家属于威权政体或仅有低限度竞争性选举的“两不像政体”(hybrid regimes),执政政权难以通过法律程序实现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构建。反对派由于缺乏表达自身诉求与开展权力竞争的合法渠道,极易转入地下活动,甚至成为周边国家实施政治渗透的代理人。此类国家常常出现魅力型领袖,包括土耳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埃及的贾迈勒·阿卜杜尔·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和叙利亚的哈菲兹·阿萨德(Hafiz Assad)等。纵然具有魅力的领袖可以通过自身威望获得忠实服从、维持政权稳定与抵消反对派的影响,然而一旦他们去世,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将会显著暴露。

^① Marco Pinfari, "Reg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in Robert Goodin, ed., *Oxford Handbook Online in Political Science*, 2016, DOI: 10.1093/oxfordhb/9780199935307.013.86.

^② 马克斯·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70—271页。

与此同时，中东地区还存在大量君主制国家，其中摩洛哥和约旦实行二元君主制和多党竞争性选举，但君主掌握内阁的任命权进而控制国家的行政权。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和阿曼等近似绝对君主制，议员多由君主任命，而且禁止政党活动，君主的权力较少受限。这些国家的王室统治合法性多源于历史传统，但除阿拉维王朝自 1664 年开始统治摩洛哥且自称“穆圣后裔”外，其他多数君主制国家的王室统治时间普遍较短，神圣性和正当性并非根深蒂固，因此其统治精英需要应对部落和宗教团体等势力的权力竞争。

鉴于上述背景，中东共和制与君主制国家独立后均经历了频繁动荡与多次政变。这种历史经验使执政精英长期面临深刻的合法性危机，形成了独特的安全感知模式。与传统国家中心主义安全观不同，中东各国在地区安全合作决策中奉行“政权生存优先”（regime survival first）的威胁评估逻辑，执政精英更倾向于将国内挑战视为核心安全威胁。由于合法性基础薄弱，政权对内部反对力量及可能的外部支持高度敏感。^① 一个典型的例证是，沙特阿拉伯对伊朗的提防更多是由于其支持本国什叶派反政府团体，而非惧怕伊朗本身。^② 因此在分析中东国家的威胁感知和平衡策略时，需要考虑到政权主体与国家主体的利益差异。

3. 感知过程

威胁平衡理论通常假定，决策主体对威胁的感知及其采取的平衡手段是单向的线性趋势，因而未能揭示其中的复杂机制，也难以解释为何在面临共同威胁时，一些国家可以通过有效的地区安全合作平衡威胁，另一些国家则无法形成有效的地区安全合作以应对共同威胁。本文通过引入威胁反应、威胁衍生和威胁排序三个中介变量，分析威胁感知的作用机制与复杂过程（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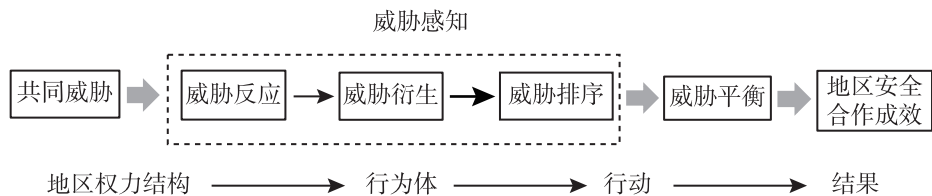


图 1 威胁感知的分化机制、威胁平衡与地区安全合作实践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① Silvia Colombo, “Foreign Policy Activism in Saudi Arabia and Oman: Diverging Narratives and Stances Towards the Syrian and Yemeni Conflicts,”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52, No. 2, 2017, pp. 56–58.

② Toby Matthiesen, “A ‘Saudi Spring?’: The Shi’a Protest Movement in the Eastern Province 2011–2012,”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6, No. 4, 2012, pp. 643–651.

首先是威胁反应。中东国家间的权力边界较为模糊，国家间相互渗透和干预成为常态，这不仅导致地区国家间信任度极低，也使地区版图格局缺乏稳定性。当某些行为体展现出明确的领土扩张意图与实力时，各决策主体对安全威胁的应对往往呈现出明显的机会主义倾向，它们不仅评估威胁本身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还会战略性地考量其在权力重组过程中的潜在收益。这种反应模式催生了一个重要的区域安全现象：共同威胁引发的权力结构变动通常不会形成简单的施动方与受威胁方二元对立格局，而是引发多行为体参与、多维度展开的复杂博弈。尤为关键的是，部分决策主体可能将这种结构性失衡视为拓展势力范围的战略契机，进而在应对共同安全威胁时采取与集体安全预期相悖的选择。这种双重逻辑使地区国家的安全决策呈现矛盾性特征：既采取了防御性的安全措施，又积极利用地区乱局实施对外渗透，形成安全防御与机会主义扩张并存的复合行为模式。

其次是威胁衍生。受领土国家的非稳定性、国家间相互渗透以及国家间权力差距较小等地区特征影响，中东各国互不信任，即便为应对共同威胁而暂时结盟，成员国间也多有猜疑。一方面，盟国容易陷入格伦·斯奈德（Glen Snyder）描述的“联盟安全困境”，既需要展现自身价值以免被盟友抛弃，又要极力避免被盟国牵连进自身不愿深度参与的冲突；^①另一方面，对中东各国精英集团而言，“敌人”与“盟友”并非泾渭分明，二者均可能通过扶植代理人、开展跨国身份动员等方式挑战其执政地位。当地区权力结构变迁引发多方博弈时，各决策主体或将面临来自“敌人”和“盟友”的多重威胁感知。

最后是威胁排序。中东权力结构的剧变并非表现为单一地区力量对其他力量的威胁，而是呈现多重矛盾与多种威胁并存的趋势。如果不同决策主体的威胁排序明显错位，则极易引发区域合作分歧与摩擦。在中东地区，决策主体间的威胁感知错位可能源于两方面：其一，行为体对威胁信号的选择、感知和判断未必源于客观的权力位置对比，而是需要考虑感知主体的自主性及观念在塑造其主观感知中的作用。有研究指出，观念威胁对行为体威胁判断的影响可能比军事力量对比的变化更为显著。^②各行为体基于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形成了对行为的不同认知，因此共同的外

^① Glen H. Snyder,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in Robert L. Rothstein, ed., *The Evolution of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ssays in Honor of William T. R. Fox*,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1, p. 189.

^② Lawrence Rubin, *Islam in the Balance: Ideational Threats in Arab Politic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21-40; 章远、肖秀女：《威胁平衡视角下以色列“外围战略”的复归及现实困境》，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4年第4期，第70—72页。

部威胁常常未必能被同样面临威胁的行为体一致地识别，而且不同行为体对威胁的定义与优先排序存在差异。其二，执政精英将防范反对派威胁政权生存列为优先事项，因此在对外事务上的首要担忧是周边国家与本国反对派里应外合。由于各国政权面临的内部挑战来源及其外部关联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国家形成了迥异的地区威胁感知排序。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国后，阿拉伯各国均将其列为首要地区威胁并采取了集体军事行动，约旦也曾在战争中吞并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土地，引起地区各国更多维度的安全焦虑与版图危机。在此背景下，那些与以色列直接矛盾较小的地区国家有可能将约旦等阿拉伯国家视为更严重的安全威胁。

四、西亚北非动荡以来国家威胁感知的错位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东始终没有形成稳定的安全秩序，地区行为体经历了周期性的威胁感知错位，包括五次中东战争中对以色列的威胁感知、伊斯兰革命后对伊朗的威胁感知以及海湾战争中对伊拉克的威胁感知等均存在差异与变化。这一特性延续至今，并在西亚北非动荡爆发后表现得尤为明显。

2010年年底至2011年的西亚北非动荡肇始于突尼斯的大规模反政府浪潮，并迅速席卷20余国，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纷纷发生政权更迭，叙利亚则陷入持久内战，引发中东安全形势的急剧恶化，系统性威胁骤然升级。此后数年，中东至少出现过两大共同安全威胁：一是地区权力结构剧变使合法性不足的政权陷入“幸存者恐惧”，整体安全焦虑水平大幅攀升；二是多国政权更迭带来的权力真空为“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在2013年后的扩张创造了条件，对地区各国安全构成了挑战。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东各国表面上都普遍面临国内反对势力的挑战与地区恐怖主义蔓延的威胁，却未能通过地区安全合作应对共同安全威胁。其根源在于权力边界模糊的中东国家在威胁认知上出现了分化，各决策主体在防范共同威胁的同时也将地区权力结构剧变视为拓展势力范围的战略机遇。这种国家间力量的渗透迅速催生了复合型安全威胁，加之各国对威胁优先级的判断差异，最终导致中东国家在安全威胁感知上的显著分化。

（一）威胁反应：中东国家对共同威胁的双向选择

中东国家间模糊的权力边界特征使得当地区共同威胁显现并引发权力结构变动时，各国一方面采取防御性措施来维护现有权力格局，另一方面又将这种结构性变动视为投射影响力的政治机会。在西亚北非动荡初期，各国并非将所有周边政权更

迭都视为安全威胁。以利比亚为例，在卡扎菲政权陷入统治危机时，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等地区大国及部分非阿拉伯国家未将利比亚危机视为安全威胁的升级，而是地区安全压力的缓解。这种特殊认知源于长期的历史积累。自20世纪70年代起，卡扎菲政权持续批评海湾国家的亲美政策、主张推翻君主政体，并反对埃及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有学者指出，“中东国家领导人对潜在威胁的感知更多取决于其他国家释放的修辞性和颠覆性信号”。^① 纵然利比亚与大多数中东国家的直接交集和军事冲突较少，但卡扎菲政权仍被许多地区国家视为持续性威胁来源。因此，当这一长期孤立政权面临41年来最严重的统治危机时，中东各国并未形成支持现政权的保守联盟。2011年3月初，美国呼吁阿盟参与禁飞区执行，并要求卡塔尔和阿联酋等盟友国家向北约领导的联军派遣战斗机和运输机，^② 这进一步激发了中东各国遏制卡扎菲政府的积极性，成为加速其政权崩溃的催化剂。

同时，随着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相继发生政权更迭，叙利亚因持续内战陷入权力碎片化，中东地区大国（如伊朗、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与中等强国（如阿联酋、卡塔尔）纷纷强化地区力量投射，竞相重塑区域安全秩序以谋求战略利益。具体而言，伊朗在巩固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支持的同时，利用地区权力真空扩张什叶派阵营影响力；土耳其基于“新奥斯曼主义”的外交理念，通过军事介入叙利亚冲突等举措不断强化在东地中海的战略存在；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逊尼派阿拉伯国家集团则采取对冲策略，既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削弱阿萨德政权以遏制伊朗，又要防范土耳其助长叙利亚穆兄会的发展势头。

由此可见，中东各决策主体在西亚北非动荡初期并不是简单地将地区所有国家政权危机都视作安全威胁，而是采取“防范与利用并重”的双重策略，既防范西亚北非动荡的冲击波危及本国政权稳定，也试图借助乱局向周边渗透并扩张自身权力边界。在此种双向选择的驱动下，各国联合应对共同威胁的意愿并非坚定不移。如2011年1月埃及爆发革命时，试图借机扩张影响力的卡塔尔不仅未曾展现应对威胁的意愿，反而在第一时间表示“尊重埃及人民要求变革的愿望”，^③ 并在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Muhammed Hosni Mubarak）将权力移交给最高武装部队时声

^① F. Gregory Gause III, "Balancing What: Threat Perception and Alliance Choice in the Gulf," *Security Studies*, Vol. 13, No. 2, 2003, p. 274.

^② David Roberts, "Arab Involvement in the Libyan Intervention," <https://www.rusi.org/explore-our-research/publications/commentary/arab-involvement-libyan-intervention>.

^③ Naadr Kaathim, *Ingaadh al-Aml: Al-Taariig al-Tawiil ila ak-Rabiia al-Arabi*, Masaa Publishing and Distribution, 2013, p. 9.

明,“这是积极而重要的一步”。^①

(二) 威胁衍生:地区多重威胁并存

中东各决策主体在感知威胁的早期阶段不仅采取防范威胁的正向选择来应对共同威胁,也采取利用乱局的逆向选择,通过扶植代理人等方式干预动荡国家,致使地区与国家内部政治秩序的双重碎片化现象叠加显现。随着脆弱国家内部权力结构的持续瓦解,其逐渐丧失对领土的垄断性控制权,中东地区遂涌现出更多挑战现有国家政权的非国家行为体。如果说西亚北非动荡初期的反政府抗议是挑战地区权力结构的“初始威胁”,那么随后数年间,该地区迅速衍生出多种并存的安全威胁形态。在此过程中,三股新兴力量——以穆兄会为代表的逊尼派政治伊斯兰党派、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宗教极端主义力量以及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伊斯兰主义势力——的崛起尤为关键,它们重塑了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和安全环境,也被许多地区行为体感知为重大安全威胁来源。

首先,以穆斯林兄弟会(简称“穆兄会”)为代表的逊尼派政治伊斯兰党派在西亚北非动荡后迅速崛起,成为政权崩溃国家中最具动员能力的政治力量。根据古里安·德诺尤克斯(Guilain Denoëux)的定义,此类组织是指将宗教理念与政治目标相结合,并据此进行政治动员的团体。^②突尼斯的复兴运动党和埃及的自由与正义党作为逊尼派政治伊斯兰力量的代表,均在本国革命后的首次多党选举中获胜。这种现象并非孤立存在,政治伊斯兰政党的影响力在整个中东地区均有扩散迹象。2011年摩洛哥公正与发展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利比亚公正与建设党虽然实力较弱,但也在2012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第二;叙利亚穆兄会则颁布《誓言与宪章》,成为反对阿萨德政权的重要力量。

其次,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宗教极端主义力量加剧了地区威胁的复杂性。“伊斯兰国”的前身为“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在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与叙利亚陷入内战的背景下,“伊斯兰国”利用两国政治真空与治理脆弱而扩充兵源。2014年攻占摩苏尔标志着该组织成为影响中东乃至全球安全的极端势力。不同于“基地”组织等早期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占领区设立行政机构,征收税款、管理市场甚至发行货币,试图建立实体政权。自2014年起,“伊斯兰国”还在北非、南亚和

^① Giorgio Cafiero, “Saudi Arabia, Qatar and the Arab Spring,” <http://weekly.ahram.org.eg/2012/1119/op6.htm>.

^② Guilain Denoëux, “The Forgotten Swamp: Navigating Political Islam,” *Middle East Policy*, Vol. 9, No. 2, 2002, p. 61.

西非等地设立分支,形成了跨区域的“建省”网络。^①

最后,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伊斯兰主义势力在西亚北非动荡后显著强化了跨境影响力。一方面,伊朗领导的什叶派阵营巩固原有的盟友网络,如派遣大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进入叙利亚以支持叙利亚政府军作战,同时借黎巴嫩真主党打击叙利亚南部反对派,使沙特阿拉伯等逊尼派国家颠覆阿萨德的愿望落空。在伊拉克,巴德尔组织、“真主旅”等亲伊朗民兵2014年联合组建“人民动员组织”,成为事实上独立于国家控制之外的武装力量。^②另一方面,伊朗也积极在中东拓展战略空间。2014—2015年亲什叶派胡塞武装占领也门首都萨那后,伊朗和胡塞武装组织在削弱沙特阿拉伯等议题上形成趋同利益并相互借重,^③由此将“什叶派之弧”的地理范围从新月地带拓展至阿拉伯半岛。

综上所述,随着地区动荡的持续发酵,中东各决策主体并非仅仅感知到单一的威胁来源,而是意识到多重威胁并存。这种多元化的威胁认知显著增加了它们在威胁评估与地区安全合作决策过程中的复杂性。以沙特阿拉伯为例,其安全考量不仅需要防范地区反政府力量对现有政权的直接挑战,还必须审慎评估三股力量的相对威胁程度。更为复杂的是,沙特阿拉伯还需要权衡如何避免出现其中一方势力削弱而导致另一方趁机坐大的局面。不同决策主体对这些威胁的感知与排序往往存在显著差异,这进一步加剧了地区集体安全合作困境。

(三) 威胁排序: 中东国家间的威胁排序存在差异

当多元主体和多重威胁并存时,从结果来看会形成威胁的排序。本文认为,倘若主体间的排序相似,将更容易形成旨在平衡共同威胁的区域合作;但如果排序出现明显的错位,就会出现相互掣肘与区域合作遇阻。就中东地区而言,随着多重威胁的同时出现,中东多决策主体对各类威胁的优先排序截然不同,由此导致地区国家间出现威胁感知错位。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东各国及其精英群体的利益范围不一致,决策主体在感知威胁并制定平衡对策时往往将政权存续视为首要目标。因此,各国对安全威胁的判断主要基于外部势力对国内反对派的支持程度,而不是单纯的国家间实力对比。

^① Rohan Gunaratna and Natasha Hornell-Scott, “The Islamic State Wilayats & Global Expansion,” *Counter Terrorist Trends and Analyses*, Vol. 8, No. 8, 2016, pp. 3-7.

^② Paul Iddon, “How Iraq’s al-Hashd al-Shaabi Turned into an Iranian Foreign Policy Instrument,” <https://www.arabnews.com/node/1875936/middle-east>.

^③ 金良祥、曹燕媚:《伊朗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准联盟关系探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4年第3期,第131—156页。

1. 穆兄会崛起的威胁感知差异

由于历史上卡塔尔与埃及穆兄会联系密切，卡塔尔未将其视为安全威胁。20世纪50年代，卡塔尔为推动宗教教育，从埃及招集了阿卜杜勒-巴迪·萨齐尔（Abdul-Badi Saqr）和谢赫祖海尔·沙维希（Sheikh Zuhair Al Shawish）等穆兄会骨干开办宗教学校。西亚北非动荡后，受历史传统影响，相较于联系较少的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卡塔尔更愿意在动荡国家支持穆兄会。同时，由于穆兄会等级结构严密且动员能力强，^①一些卡塔尔政治精英认为其更有可能在动荡国家主导政坛，扶植穆兄会或可推动这些国家建立亲卡塔尔政府。

与卡塔尔不同，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王室将穆兄会所代表的逊尼派政治伊斯兰组织视为影响其政权稳定的重大威胁。21世纪初，穆兄会呈现出淡化宗教色彩的温和化趋势，^②且西亚北非动荡以来执政的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放弃将伊斯兰教法作为国家立法基础，沙特阿拉伯政治精英担忧穆兄会在多国兴起会动摇瓦哈比主义在本国的根本地位，^③进而为国内反对派挑战官方意识形态制造舆论环境。^④在阿联酋2011年3月的“百人请愿”事件中，与穆兄会关系密切的“改革社团”成员公开要求政治改革，^⑤引起了王室的警惕。在埃及，2013年7月阿卜杜勒·塞西（Abdel al-Sisi）通过政变推翻有穆兄会背景的默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总统后，将穆兄会定性为极端组织并进行武力镇压。由此，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与卡塔尔在穆兄会问题上形成显著的威胁感知错位。

2. 什叶派阵营扩张的威胁感知错位

作为伊朗的主要地区对手，沙特阿拉伯将遏制什叶派阵营扩张列为首要安全关切。这既出于沙特阿拉伯对西亚北非动荡后什叶派阵营扩张削弱自身的地区影响力的担忧，也是出于对伊朗通过意识形态动员激发沙特阿拉伯国内反对派运动的忌惮。沙特阿拉伯虽然是逊尼派为主体的国家，但什叶派人口占比为10%—15%。2011年3月，什叶派活动人士联合逊尼派反对派共同发起了“愤怒日”示威，直接挑战沙

^① Ziad Munson, “Islamic Mobilizatio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and the Egyptian Muslim Brotherhood,”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Vol. 42, No. 4, 2001, pp. 487-510.

^② 哈全安：《世纪之交埃及伊斯兰主义的新动向》，载《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6期，第144—152页。

^③ 瓦哈比主义是18世纪中期兴起于沙特阿拉伯的宗教极端主义思潮，创始人伊本·瓦哈卜（Ibn Abd al-Wahhab）。

^④ Mohamed Mokhtar Qandil,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Saudi Arabia: From Then to Now,”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fikraforum/view/the-muslim-brotherhood-and-saudi-arabia-from-then-to-now>.

^⑤ Andrew Chappelle, “Abu Dhabi’s Problem with the Muslim Brotherhood: How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Broad Definition of ‘Extremism’ Has Impacted Regional Politics Since 2011,”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8/05/abu-dhabi-problem-muslim-brotherhood-180526105937656.html>.

特阿拉伯的公民权利体系,^① 引发了沙特王室的不安。值得注意的是, 倡导“变革政治”的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 转而对伊朗推行无条件接触政策。^② 他不仅发表视频讲话祝贺伊朗新年, 还全面参与伊核谈判。美国与伊朗关系缓和加剧了沙特阿拉伯的安全焦虑, 强化了其对伊朗的威胁感知。为此, 沙特阿拉伯启动了双轨并行的平衡威胁策略, 对内应对抗议活动, 并于2016年处决什叶派年轻一代激进领袖尼米尔·尼米尔(Nimr al-Nimr), 对外加大力度反对中东什叶派阵营, 甚至一度与伊朗断交。

与沙特阿拉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部分什叶派人口较少的中东国家对伊朗及其盟友的威胁感知相对较弱, 其中埃及、阿曼和卡塔尔三国较具代表性。首先, 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ul Fatah Al-Sisi)就任埃及总统后, 认为自身与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在打击穆兄会问题上存在利益契合点, 并且两国同为世俗中央集权国家的代表, 因此埃及没有跟随沙特阿拉伯反对巴沙尔政权, 反而明确支持叙利亚政府军。^③ 其次, 阿曼因历史上与伊朗关系密切, 又亟须与之开展能源合作, 且主流信仰为伊斯兰教伊巴德派, 担心偏向任何一方都会给本国带来安全风险, 因而选择保持中立而未跟随周边国家与伊朗断交。最后, 卡塔尔的立场更为复杂, 其人口结构单一, 受西亚北非动荡冲击较小, 对威胁的排序呈现两重特征。一方面, 相较于对什叶派势力扩张的戒备, 卡塔尔更担心加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反伊朗阵营可能受其牵连而招致伊朗的打击报复; 另一方面, 作为与沙特阿拉伯接壤且国力相对弱小的地区国家, 卡塔尔始终对沙特阿拉伯可能进行的政治渗透保持高度警惕。

五、中东国家的威胁平衡手段与地区安全合作实践

如前所述, 西亚北非动荡爆发之初, 中东各国决策主体既将共同威胁视为防范对象, 也将其当作扩张机会。此后随着地区国家间的相互渗透与干预, 该地区在权力结构变动与政治真空扩大的背景下出现多重地区威胁。由于各决策主体对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阵营、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宗教极端主义以及以穆兄会为代表的逊尼派政治伊斯兰势力等不同威胁的排序差异巨大, 而且决策主体之间缺乏信任,

^① Toby Matthiesen, *Sectarian Gulf: Bahrain, Saudi Arabia, and the Arab Spring That Wasn'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8.

^② 沈鹏:《奥巴马政府对伊朗政策的调整》, 载《美国研究》, 2011年第1期, 第26—33页。

^③ “Egypt’s Sisi Expresses Support for Syria’s Military,”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6/11/23/egypts-sisi-expresses-support-for-syrias-military>.

因此集体安全决策体系共识难以形成。在此情形下，各国决策主体平衡威胁的举措呈现出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地区安全合作制度的松散化。中东各国既认识到加入区域合作组织有助于维护自身政权合法性并改善本地区的国家间关系，又高度警惕超国家机制和跨国身份动员对本国政权的潜在威胁。二是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多元化。鉴于中东国家常常感知到多重安全挑战，而且认为“盟友”与“敌人”同样可能危及自身政权稳定，各国倾向于参与多个区域组织，通过议题导向的合作模式与不同国家建立灵活伙伴关系，从而避免对特定国家形成过度依赖。然而，最终无论是机制化的安全合作还是临时性协作都陷入了失能状态，既未能有效应对地区安全威胁，也无力维护地区稳定。

（一）机制化地区安全合作失灵

西亚北非动荡初期，在威胁反应阶段，许多决策主体并未将所有的地区反政府运动都视为威胁，甚至试图推动一些与己不睦的国家发生政权更迭，以便扩大自身在周边国家的影响。因此，与20世纪60年代东南亚国家的集体自卫方式不同，20世纪头十年西亚北非动荡之初，各国既没有将应对共同威胁作为阿盟的首要议题，也没有为确保政权稳定而强化组织功能，着力提升阿盟的集体安全体系与开展制度化的军事合作。相反，各国在阿盟框架下采取了一系列非常规集体行动，目标并非维护成员国政权稳定，而是集中削弱卡扎菲政权和巴沙尔政权。具体而言，阿盟于2011年3月支持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973号决议，授权国际社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并采取保护平民的军事行动；^①2011年11月，阿盟中止叙利亚成员国资格，并对其实施高级官员旅行禁令、资产冻结和央行交易限制等制裁措施。这些举措既违背了阿盟一贯坚持的维护成员国主权原则，也为西方干预利比亚和削弱叙利亚政权创造了条件，使本已制度松散的地区组织面临新的有效性危机。

面对阿盟框架下的集体行动困境，部分中东国家转向更小规模的次地区组织来平衡其最为关切的地区威胁。一个典型的尝试是2011年3月海合会君主制国家向巴林派遣“半岛盾牌”部队，协助平息当时海湾地区规模最大、伤亡最重的反政府运动，体现了海湾君主国防止抗议浪潮外溢、维护政权稳定的共同诉求。然而，在各国纷纷扩张权力边界致使国家间相互猜疑的背景下，此类集体安全合作并不常见。在巴林危机平息后，海合会组织内部的矛盾日益突显。例如，沙特阿拉伯试图吸纳摩洛哥和约旦以增强抗衡伊朗的实力，但遭到科威特、卡塔尔和阿曼等成员国的反对。它们担心组织扩张将强化沙特阿拉伯对海合会的主导权，使其得以借此干预邻

^① Martin Chulov, "Arab League to Reiterate Backing for Libya No-Fly Zone," *The Guardian*, March 22, 2011.

国内政。^①

随着中东反政府浪潮持续蔓延并引发多国政权更迭，地区行为体趁机突破既有权力边界以扩张影响力，使得该地区主要决策主体面临多重威胁的感知与评估难题。在威胁衍生与威胁排序的过程中，由于各主体对威胁的辨识与优先级排列存在差异，地区组织成员国的内部分歧与对立不断加剧。

表面上看，2013—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崛起是地区各国共同面临的安全威胁。2015年，阿盟秘书长纳比勒·埃拉拉比（Nabil Elaraby）呼吁组建一支约4万人的阿拉伯联合部队，包括3.5万名地面部队、5000名海军和500—1000名空军，旨在反恐并干预也门和利比亚冲突，协助两国尽快恢复秩序。^②然而，这一机制化方案未能得到各成员国的一致支持，主要受制于两个关键因素：一方面，中东各决策主体对地区威胁优先级的感知存在根本分歧。各方都希望借助阿盟集体安全机制优先应对自身最关切的威胁，导致在确定行动目标时难以协调。在商讨行动对象时，各成员国从自身的安全考量和政治偏好出发，对“恐怖主义”的定性各不相同，埃及、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均将穆兄会视为打击对象，卡塔尔则支持穆兄会，而在突尼斯，亲穆兄会的复兴运动党更是政府的组成部分。这种威胁感知差异导致各方难以就联合部队的打击目标达成共识。另一方面，埃及、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等国对地区大国主导的军事合作持谨慎态度，担心联合部队可能成为干预内政的工具。突尼斯甚至声称该提议“既不现实也不可行”，认为联合军队给自身政权带来的潜在风险可能远超反恐收益。^③这一立场反映了阿盟作为松散组织的制度性局限，即成员国始终将政权安全置于地区集体行动之上。

在次地区组织框架下，安全合作同样面临挑战。以海合会为例，成员国在应对穆兄会和什叶派阵营等问题上存在感知错位，这种分歧持续积累，终于导致该组织在2017年爆发了严重的内部危机。2017年5月，卡塔尔官方媒体披露其领导人批评海合会对伊朗的制裁政策并与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Hassan Rohani）通话，^④随后沙特阿拉伯等多国与卡塔尔断交。卡塔尔随即全面恢复与伊朗的关系，并缺席

^① Sara Hamdan, "Gulf Council Reaches Out to Morocco and Jordan,"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5, 2011.

^② "Arab League Agrees to Create Joint Military Force," <https://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32106939>.

^③ Florence Gaub, "Stuck in the Barracks: The Joint Arab Force," <https://www.iss.europa.eu/content/stuck-barracks-joint-arab-force#>.

^④ "Iran President Holds Phone Conversation with Qatari Emir over Gulf Relations," *The National*, May 27, 2017.

了2018年举行的海合会峰会。这些举措不仅削弱了海合会的制度凝聚力和运作效力，更是一度导致其陷入瘫痪。

（二）临时地区安全合作乏力

在地区多重威胁叠加的复杂安全环境下，传统区域与次区域组织已难以满足中东各国平衡威胁的需求。随着主要国家普遍认为所谓“盟友”既不可靠也难以预测，它们转而建立各类临时安全合作机制以应对特定威胁。此类机制通常表现为任务导向的临时安排，合作期限相对较短。^①这种合作形式灵活性更高，使得互信程度较低的中东国家能够针对不同威胁、与不同对象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安全合作。本文发现，西亚北非动荡爆发后，地区国家至少进行了三次组建此类临时安全合作机制的重要实践，这些尝试充分反映了地区国家在传统多边框架失效情况下的安全合作新趋向。

第一次实践是2015年3月的“果断风暴”军事行动。对中东君主制国家而言，伊朗的意识形态立场与革命输出政策构成了双重挑战：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伊朗公开反对君主制政体；从外交实践层面来看，其持续的革命输出行为直接强化了海湾国家的安全忧虑。2014年，亲伊朗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首都萨那，沙特阿拉伯和巴林等海湾君主国首次面临什叶派势力深入海湾地区的战略困局，威胁感知达到顶峰。2015年3月，沙特阿拉伯牵头海合会国家，联合约旦、摩洛哥等阿拉伯君主国以及埃及塞西政权，试图通过空袭、海上封锁和派遣地面部队等方式遏制什叶派的扩张。

然而，这一临时安全合作机制面临双重结构性缺陷：一是军事能力的局限性。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主力缺乏有效的现代化作战体系，严重制约了行动效果。二是成员国间存在战略分歧。2017年卡塔尔危机导致其撤出参战部队，阿联酋将“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视为首要威胁，与沙特阿拉伯将胡塞武装列为核心威胁的认知相悖，两国渐行渐远削弱了合作基础。最终，阿联酋转而支持也门南方过渡委员会，沙特阿拉伯则继续扶植哈迪政府，导致联军目标碎片化。军事能力的不足与合作机制的缺陷致使联合行动未能达到预期。联军虽然成功协助哈迪政府夺回亚丁，却未能瓦解胡塞武装对也门北部的控制。2019年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阿美石油设施事件更是造成沙特阿拉伯石油产量骤减一半，^②这也印证了美国助理国务卿蒂姆·伦德金（Tim Lenderking）的判断：“针对也门的联合军事行动是

^① Degang Sun and Dandan Zhang, *Diplomacy of Quasi-Alliances in the Middle East*, Gerlach Press, 2020, pp. 1-4.

^② Yun Li, “Saudi Oil Production Cut by 50% After Drones Attack Crude Facilities,” <https://www.cnn.com/2019/09/14/saudi-arabia-is-shutting-down-half-of-its-oil-production-after-drone-attack-wsj-says.html>.

一场失败。”^①

第二次实践是2015年年底成立的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面对“伊斯兰国”的迅速扩张，中东及周边国家共同面临宗教极端主义的威胁。在阿盟组建阿拉伯联合军事力量遭遇长期搁置之际，沙特阿拉伯呼吁海合会国家与土耳其、埃及、约旦、黎巴嫩、突尼斯、利比亚、也门等中东国家以及部分南亚与非洲国家共同组建了伊斯兰国家反恐军事联盟。然而，该联盟同样面临地区安全合作困境。首先，成员国数量多达40余个且地域分布广泛，导致协调难度增加。其次，该联盟的目标是在打击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埃及和阿富汗等地的恐怖主义方面开展政策沟通。然而存在感知错位的各国就“恐怖主义”的具体指向产生了分歧，鉴于伊朗等什叶派阵营行为体并未参加该联盟，埃及等成员国质疑沙特阿拉伯可能借反恐之名打击叙利亚巴沙尔政权。此外，时任沙特阿拉伯副王储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表示，该联盟应当在利雅得建立行动中心。^②不少成员国担心沙特阿拉伯的动机是强化其内部安全和扩张其权力，也有国家认为沙特阿拉伯与阿联酋或将在该联盟框架下通过与非洲国家开展联合训练介入非洲政局，^③黎巴嫩等国因此不愿做出实质性的军事承诺与资源投入。^④由于上述结构性缺陷，伊斯兰国家反恐军事联盟的实际成效十分有限，其活动主要局限于联合军演和会议磋商，未能形成有效的反恐合作。

第三次实践是卡塔尔断交危机后由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和埃及组成的小规模临时性联盟，旨在平衡卡塔尔及其支持的穆兄会等逊尼派政治伊斯兰势力。然而，随着沙特阿拉伯等国与卡塔尔的关系逐步缓和，该机制的实际效用迅速弱化。

近年来，中东各国对以色列的威胁感知出现了显著分化，这不仅使地区大国间难以达成共识，也加剧了地区安全合作的复杂性，这种威胁感知的差异尤其体现在各国对以色列政策的不同立场上。2020年，在美国推动《亚伯拉罕协议》的背景下，阿联酋和巴林不再将以色列视为军事威胁并与之正式建交，而阿尔及利亚、科威特和黎巴嫩等国坚持反对在巴勒斯坦问题未获解决前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相较之下，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等关键国家的威胁感知更加复杂。沙特阿拉伯虽然与

^① Ali Harb, "US Envoy for Yemen Blames Houthis for Failure to Reach Ceasefire,"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news/us-envoy-yemen-blames-houthis-failure-reach-ceasefire>.

^② Mohammed Fahad Al-Harhi, "Riyadh Conference and the Turning Point," <http://www.arabnews.com/columns/news/902896>.

^③ Michael William Wilson, "Extremism in the Sahel: A Region in Crisis and the Search for New Allies," <https://www.grc.net/single-commentary/215>.

^④ "Lebanon FM Says Not Member of Saudi Anti-Terror Coalition," *The Daily Star Lebanon*, December 15, 2015.

以色列在遏制伊朗威胁上存在共同利益，但从政权安全角度出发，沙特王室担忧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可能损害其作为两大宗教圣城守护者的合法性。这一顾虑在2023年10月“阿克萨洪水”行动后尤为突出，沙特阿拉伯在此后多次表示在巴勒斯坦建国前不会承认以色列。^①在埃及，塞西上台初期曾尝试与以色列合作制衡穆兄会，^②但在2023年以来的巴以冲突中，因担心国内抗议者和巴勒斯坦难民涌入，塞西一方面激烈批评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政策，另一方面努力在 Hamas 与以色列之间居中调解，显示出其多重考量。这种分化的威胁感知直接削弱了地区合作机制的有效性。加沙冲突持续两年多以来，中东的区域组织、次区域框架以及临时合作机制全面失灵，未能促使地区冲突实质性降级并缓解人道主义危机，反映出威胁感知错位对区域合作的严重制约。

六、结论

中东是发展中国家较早尝试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地区之一，尽管各类安全合作倡议层出不穷，但该地区的安全合作实践存在少数成功和多数失败的基本现实，并由此成为全球范围内地区安全合作成效最不显著的典型案例。西亚北非动荡爆发后，中东国家通过三个层级的合作机制展开尝试，包括地区层面的阿盟、次区域层面的海合会以及各类临时安全合作安排。然而，无论制度化程度如何，这些机制最终都未能摆脱内部分裂与功能失效的共同命运。本文认为，美国对中东安全秩序的主导能力逐步下降，但其维持单边安全秩序的意愿仍具惯性，这在客观上既为本土性共同安全秩序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又在主观上极力抑制了“去中心化”秩序的萌芽，进一步突显了构建具有包容性、自主性与合作性安全架构的紧迫性。^③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正是着眼于这一目标，将中东作为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重点合作方向，支持地区国家“建设包容、共享的地区集体合作安全机制”。^④为此，中国发挥了与中东各国长期交往中形成的外交信誉优势，积极为地区国家间的安全对话提供公共产品，成功斡旋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和解，为中东各国跳脱冲突循环与

^① 《沙特外交部：坚定不移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https://www.news.cn/world/20250205/647c281f7f884c859101da3bc82b678e/c.html>。

^② David D. Kirkpatrick, “Egypt Tried to Block Broadcast of CBS Interview with President Sisi,” *New York Times*, January 4, 2019.

^③ 刘中民：《从单边安全到共同安全：冷战后中东地区安全秩序的进化》，载《外交评论》，2025年第4期，第75页。

^④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载《人民日报》，2016年1月14日。

实现和平共存提供了新的路径。

中东的地区安全合作困境在理论和政策两个层面都值得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不同地区结构中行为体的感知因素与决策机制的互动关系。在理论层面,本文对威胁平衡模型做出了三项修正。首先,从中观层次探讨共同威胁如何影响地区权力结构,进而引起国家间行为模式的变化,有助于从更加多维立体的视角审视共同威胁对地区与地区内行为体的影响。其次,本文发现,在中东地区存在国家建构不完善且执政精英合法性普遍不足的政治现象。当民族国家并非新现实主义预设的铁板一块且执政精英利益与国家利益存在差异时,有必要将各国的精英团体作为主体考察其威胁感知与平衡政策。最后,本文尝试在威胁感知和威胁平衡之间建立更加全面的因果机制,立足于地区国家间的权力边界模糊以及国家和精英团体的利益范围不吻合的现实,讨论各国对地区威胁感知的分化机制,并引入威胁反应、威胁衍生和威胁排序三个中介变量。

在经验层面,首先,本文尝试从宏观维度解释中东国际关系的深层悖论。中东多民族、宗教、部落与宗派等超国家因素并未助推地区安全合作,^①反而因跨国身份认同的广泛存在加剧了现代国家构建的困难,并为地区国家间权力边界的相互渗透创造了条件。这既催生了各决策主体的安全焦虑,阻碍了主体间信任的建立,也是地区合作组织制度性孱弱的关键成因。其次,本文在微观维度刻画了中东地区安全合作模式的演变轨迹,即从正式区域组织到次区域机制再到临时合作主导的变迁。尽管有研究将此类临时安全合作机制视为各国战略自主的表现,^②但本文认为这实为制度化合作失效情况下的一种被动选择。更加值得警惕的是,这种临时平衡策略不仅无助于化解地区矛盾,反而可能加剧地区结构的不确定性,形成地区动荡与安全合作失灵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相关议题:一方面,可从中观层面聚焦东南亚、拉美和非洲等地区的感知情境,探讨地区差异对国家间关系与行为模式的塑造机制;另一方面,可将其他地区的安全合作纳入统一比较分析框架,通过跨区域比较剖析不同主体的威胁感知差异如何影响各地区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合作行为,拓展威胁平衡模型的实证空间,构建更具解释力的国际关系理论。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① 尹继武:《文化与国际信任——基于东亚信任形成的比较分析》,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第25页。

② Navdeep Suri, "Saudi Moves Impacting West Asian Geopolitics," <https://www.orfonline.org/research/saudi-moves-impacting-west-asian-geopolitics>.

rect policy assessments. In the last case, the US relied on both the communist and nationalist lenses, thereby mitigating the influence of any single ideology and reaching a correct assessment. When a great power is aware of risks of a particular ideological lens' dominance in its policymaking, the great power should intentionally include different ideological lenses in its policymaking process, and eventual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ts policies in an uncertain world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Keywords】 great-power competition, overseas military bases, ideology, the Cold War, the US-Soviet competition

【Author】 HUANG Yuxing,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Wu Yuzhang Young Scholar,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ommon Threats, Perceptual Misalignment, and the Dilemma of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fter 2011

ZHANG Chuchu (62)

【Abstract】 Security cooperation experience in the Middle East shows that regional states facing common threats often fail to build robust security cooperation institutions or achieve effective collaboration. The balance-of-threat theory struggles to explain this dilemma, as it fails to account for the regional security context and the actors' varied responses to multiple threats. This study revises the tradition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by contextualizing common threats and threat perceptions, introducing three mediating variables—threat response, threat derivation, and threat prioritization—to reveal the complex dynamics of threat perception and cognitive disparities among actors. Empirical analysis finds that since 2011, common threats have not fostered unified threat perceptions among Middle Eastern decision-making entities but intensified mutual distrust instead. This misalignment disrupted and even undermined the region's collective threat balance, leading to repeated setbacks in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sub-regional mechanisms, and informal initiatives.

【Keywords】 Middle East, perceptual misalignment, threat balance, 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the upheaval of Northern Africa and Middle East

【Author】ZHANG Chuchu,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Analogies, Cues, and Reasoning: Behavior Explanations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DING Lu (88)

【Abstract】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way decision-makers interpret adversaries' actions shapes subsequent strategy choices, thereby shaping critical security issues such as the trajectory of détente, the dynamics of crises, and the reconfigur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Behavioral explanations involve both “element diagnosis” and “causal inference”, yet existing studies often focus narrowly on the diagnostic mechanisms of a single explanatory element and its associated biases. Clarifying the logical connections among different explanatory elements helps reveal how decision-makers combine multiple explanatory elements in causal inference mechanisms. Decision-makers typically employ three types of explanatory elements: analogies, cues, and reasoning. Analogies serve a “framing” function, helping decision-makers form a preliminary interpretive framework by rapidly acquiring cues and reasons. Attributive and situational cues serve a “calibration” function, correcting biases in reasons to ensure logical coherence. Reasons such as motives, intentions, and resolve serve an “adjustment” function. Minor adjustments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existing explanations, while major adjustments drive the fundamental revision of the interpretive mechanism. This analytical framework offers an empi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US-Soviet relations case in 1989, providing a dynamic depiction of decision-makers' cognitive systems and offer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enhancing decision-making quality.

【Keywords】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cognitive bias, causal inference, signaling theory, US-Soviet relations

【Author】DING Lu,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tudie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